

## 你好，十四五

编者按

2021年两会落幕，“十四五”启程。“十四五”期间，中国要构建新发展格局，实行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更好对接。这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也势必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在这过程中，我们该如何激活国内大市场？以各类特殊区域为主的开放平台该扮演怎样的角色？企业又该如何主动融入双循环？求知欲爆棚的你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的特别报道，以特别的方式说一句：你好，“十四五”！

全国人大代表、TCL创始人李东生：  
中企应积极融入双循环强化全球化业务

■ 本报记者 张凡

“TCL聚焦高科技、重资产、长周期产业。在上述产业发展中，技术如何做到不断追赶超越？核心器件、材料和装备方面如何受制于人？市场拓展方面如何适应新的全球经济格局和贸易规则的变化？这些都是‘十四五’时期，中国企业需要特别关注和大力解决的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工商联副主席、TCL董事长李东生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企业需要积极融入双循环，强化全球化业务。

在李东生看来，目前国内市场难以完全消化中国制造业的产能规模，国内企业需要以走出去的方式实现业务扩张，将产业制造优势扩展到全球，获得更大发展空间。这就要求企业加强自主创新，打破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突破贸易保护主义的藩篱。结合TCL的实践，李东生将这些思考转化为代表建议，建议帮助国内企业提升全球化经营能力，如建立国际贸易环境风险防控体系，拓宽企业海外发展融资渠道，支持企业海外设厂，进行本地化经营等。

尽管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但TCL还是尝到了全球化的甜头。2020年TCL海外营业

收入保持持续增长：2020年TCL品牌电视全球销售2393万台，同比增长15.9%，稳居全球前三，其中海外销售1713万台，同比增长27.2%；TCL华星大尺寸业务保持效率效益领先，电视面板市场份额保持全球第二，2020年前三季度大尺寸面板销售面积2071万平方米，同比增长44.9%，销量3448万片，同比增长14.9%。此外，TCL的2020年出口额达到111亿美元，同比增长23.6%。

总体来看，TCL探索给中企的启示有两条：一是坚持自主创新，在创新方面持续投入；二是形成全球产业链布局，使在地化生产、销售与国内出口互相配合。

“产品出口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整机产品出口；另外一部分是核心器件、材料和装备的出口。”李东生认为，核心器件、材料和装备的出口增长证明了企业全球产业链可以带动国内出口。

核心器件、材料和装备的发展，要以自主创新来提供支撑。之前都说中国“缺芯少屏”，TCL华星就努力解决了“少屏”的问题，现在针对芯片产业也有了相关布局。

李东生透露，TCL科技已经组建了半导体业务部门，寻找发展机会；发力半导体功率器件领

域，半导体功率器件不仅是TCL产品所需的主要器件，而且也是包括新能源汽车在内的大部分制造业都会涉及到的功率器件；在集成电路设计方向，围绕智能终端、半导体显示材料、新能源三个领域的相关需求寻找突破；发挥公司资本平台优势，包括旗下的产业基金，在集成电路产业领域寻求一些投资的机会，发挥产业协同效应，增强企业竞争力。

“我们现在大多是出口核心器件、材料和装备，这样就会在TCL海外产业链形成增值——在当地生产、销售，以此来支持TCL海外业务的拓展。”李东生大致计算过，在当地制造销售产品100美元，大概能带动60美元的国内核心器件、材料的出口，“尤其是在新的全球形势下，这种方式能帮助企业有效规避海外市场关税和非关税的壁垒。”

“全球化布局和制成品出口最大不同在于，前者能够真正贯彻和体现双循环的理念，是一种可持续的、能够应对全球经济格局变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挑战的业务方式。”李东生说，TCL在这条路上还会一直走下去。TCL前年开始建设的墨西哥第二工厂、印度产业园将在今年投产，已经扩建的巴西、印尼、越南等地工厂的产能也将陆续释放出来。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教授张琳：  
金融业扩大开放 中外保险机构相互借鉴

■ 本报记者 刘国民

“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稳妥推进银行、证券、保险、基金、期货等金融领域开放。“十三五”期间，尤其是2018年以来中国金融业进一步扩大开放，外资保险机构纷纷加速进入中国市场。外资保险机构在中国市场发展情况如何？外资保险机构加速入华会给国内保险市场带来哪些变化？中资保险机构在这一过程中怎样和外资保险机构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贸易报》记者专访了全国人大代表、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教授张琳。

“保险在中国虽然是舶来品，但要在国内发展好保险业，需要植根于中国文化。外资保险机构带着外来文化想融入本土市场还是比较困难的，相对来说，中资保险机构更亲和，更了解本土情况和客户的心理、行为。这也是中资保险机构在国内市场更容易取信于客户的原因。”张琳告诉记者，回顾中外保险业发展历史可以看到，保险业的发展和历史息息相关。

张琳的看法也得到了数据印证：2020年中资保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4.17万亿元，市场份额92.21%；外资保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3524.44亿元，市场份额7.79%，同比上升0.62个百分点。一方

面是外资保险机构在华市场份额依然较小，另一方面金融业扩大开放助推外资保险机构在中国市场的份额上升。

“中国金融业扩大开放，外资保险机构加速入华，能带来产品开发、风险管理方面的先进理念和方法。同时会给国内保险机构带来竞争压力，推动其改变过去较为粗放的发展方式，走向高质量发展。所以保险业扩大对外开放长远来看是有利的。”张琳分析，国内保险机构确实因此增加了一些有力的竞争者，需要对可能形成的冲击有所考虑。但国内保险业面对外来的考验已不是第一次了。较近的一次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保险业扩大对外开放，那时候国内保险机构就挺过了很多外资保险机构入华带来的竞争。

对此，张琳建议，中资保险机构应强化差异化经营，捕捉差异化机会，重在提升服务水平。尽管保险机构业务员每到年底会将新一年度日历赠给客户，但是在张琳看来，在提升服务方面这还是很浅层次的行为，更重要的是从客户角度出发打造适合他们的保险产品。例如，客户买了健康险后生病，保险机构当然要为他服务，客户没生病时保险机构也需要为他提供所需要的健康管理服务。

## 培育大湾区专业服务品牌 充分释放人才红利

■ 本报记者 周东洋

当前，中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调整与演化。在此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具有独特的不可复制的优势。如何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等国际环境和不利条件下，使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在对接国内、国际双循环方面发挥主要作用？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广东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规划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西勤和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港澳侨务委员会副主任、澳门贺田工业有限公司行政总裁贺定一等积极建言献策。

近年来，随着粤港澳合作不断扩大深化，坐拥明显区位优势、粤港澳大湾区，各方面发展取得积极成效，用占全国不到1%的国土面积、不足全国总人口5%的人口数量，创造出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12%的经济总量。

“粤港澳大湾区存在三个关税区、三种法律制度、三个货币体系，粤港澳三地深度融合存在一定障碍。”黄西勤表示，纽约、东京、旧金山三个湾区占比超过80%，特别是纽约湾区占比将近90%，而大湾区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只占

62%，整体专业服务发展水平亟须进一步提升、形成区域优势，粤港澳专业服务领域融合发展及提质增效不容忽视。

为此，黄西勤建议，要共建湾区专业服务机构与品牌，提升服务力。有关国际组织测算，一个行业世界级品牌的出现可带来行业本身及其关联产业的数倍乃至数十倍的高速增长。粤港澳专业服务业基础雄厚，大湾区要顺势而为，进一步在培育世界级品牌、实施专业品牌引领上下功夫，鼓励“粤港澳共建专业服务机构”。可先以松散型的方式达成联盟合作意向，从理念互动到项目对接，从品牌输出再转资本合作，形成紧密联系。条件成熟时，可先在法律、会计、评估行业进行试点，成立粤港澳共建法律服务机构、会计服务机构或评估机构，逐步提高专业服务集聚和一体化发展水平。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要优化粤港澳大湾区的营商环境，保持吸引力。”黄西勤提出，要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纲，以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为牵引，推进现代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改革建设，进一步明晰政府、企

业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在理论、制度、治理方面深化创新，不断突破，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稳定公平透明的一流营商环境。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先进科学技术，加强数字政府建设，让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互联互通，持续推进大湾区专业服务业的业务创新和深化合作。

此外，人才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的重要生产要素。在贺定一看来，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与发展除了依赖其自身的地域、经济、产业等优势外，人才政策的改良和完善是大湾区经济协同发展的必然趋势。大湾区各城市应形成具有竞争力的区域人才政策体系，促进人才合理流动，最大限度发挥人才效益。

黄西勤建议，要引导与推进职业资格的一体化，增强凝聚力。加大支持力度，构建强有力的粤港澳职称评价和职业资格互认统筹协调机制，努力在化解就业市场竞争障碍、扩大“一视三证”范围等领域达成有助于推进三地一体化的协议。同时，推动设立粤港澳专业人才合作协调机制，推广“大湾区专业人才卡”“专业人士通行证”等，在税收、出入境、执业从业等多个方面消除壁垒，便利更多粤港澳专业人才在湾区内就业创业，实现充分的流动与合作。

贺定一建议，要建立长效的人才工作机制。前期需要多渠道对引才需求进行调研，引入市场机制，从而合理加大高需求人才、紧缺型人才的引进力度，科学按需引进人才，并建立健全人才引进的政策保障体系。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建立健全科研人才、科研院所、粤港澳大湾区政府利益共享机制，实现个人、机构与政府的共赢，形成全社会共同推动大湾区科技创新合作的良好氛围。努力破解港澳科研人才及其家属、子女在内地城市的就业、就医、就学、社保等方面的难题，建立大湾区内地城市与港澳政府的沟通机制，解决科研人才的后顾之忧。

黄西勤表示，进入“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将呈现崭新的变化，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要更好地发挥引领作用，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 持续强化自贸试验区在开放中的首位度

■ 余宗良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加强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创新，推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与自贸试验区融合发展。发挥好各类开发区开放平台作用。与此同时，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也提出，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赋予其更大改革自主权，深化首创性、集成化、差别化改革探索，积极复制推广制度创新成果。自2013年以来，自贸试验区数量不断递增、布局不断优化、改革创新不断加强、制度红利持续释放。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20年年底，前18家自贸试验区(不含北京、安徽、湖南)以不到全国千分之一的国土面积，实现了占全国17.6%的外商投资和14.7%的进出口。

按照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的布局，自贸试验区在“十四五”期间将持续强化引领性开放功能：

首位度不断强化。在2018年即在自贸试验区建设五周年的时候，习总书记就指出，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一项战略举措，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要把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成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高地。李克强总理也提出，要自贸试验区进一步发挥改革开放“排头兵”的示范引领作用。2020年，习总书记强调，要把构建新发展格局同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等衔接起来，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并且在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中国将有效发挥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引领作用。

顶层部署指向清晰。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加强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创新，推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与自贸试验区融合发展。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在突出自贸试验区在对外开放平台中首位度的同时，在布局、赋权、制度创新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具体的部署。

数量越来越多和规模越来越大。为统筹发展与安全，中国改革开放模式具有渐进性、边际性，通过“试点试验—总结经验—复制推广”的方式进行。我国自贸试验区从2013年的1个到现在的21个，并对上海、浙江自贸试验区进行了扩区，取得的经验也将不断复制推广。

改革自主权将越来越大和系统性集成性越来越强。历经7年发展，自贸试验区改革事项将更加触及中央事权，一事一报、碎片化创新、微创新等路径依赖亟待突破，着力改善出现的“改革三多与三少”现象，即“小修小补”式改革多和重大突破性改革少、“碎片化”改革多和系统性集成性改革少、“相互借鉴”式改革多和独创性引领性改革少。

改革力度越来越大和开放程度将越来越高。“十四五”时期，我国要构建新发展格局，习总书记提出要以深化改革激发新发展活力、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这就要发挥好自贸试验区在改革开放的引领性功能，统筹发展和安全，在自贸试验区尤其是自贸港在投资自由化、贸易自由化、资金自由化、人才自由化、数据自由化等5个领域进行压力测试、快速迭代。(作者系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自贸创新研究中心主任)

## 拓展投资空间助力新发展格局

■ 本报记者 胡心媛

“近几年，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保持着50%以上的贡献率，其贡献一直超过投资，但这并不意味着消费能对经济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在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湖南财政经济学院校长刘长庚提出，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在各国经济增长普遍复苏艰难，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的复杂国际形势下，进一步增强外需拉动的潜力比较有限，应把重点放在投资和内需上，加快形成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其中，投资对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进入新发展阶段，需要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新发展格局。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商学院经济学系主任杨德才认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日趋复杂。为有效应对各种不确定性和风险挑战，就要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进而带动世界经济复苏，促进国际循环。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是把发展立足点放在国内，打通堵点、预防断点，促进经济循环畅通无阻。

杨德才建议，从需求侧看，要全面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从供给侧看，必须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工艺创新、技术创新等方式不断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

在刘长庚看来，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应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也要更好发挥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组织、引导、协调、整合等作用，充分发挥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双轮驱动”作用。

“现在及未来的投资着力点是保持投资规模合理增长和进一步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质量，重点解决好‘投什么’和‘怎么投’两大关键问题。”刘长庚说，解决好“投什么”的方向问题是更好发挥投资关键性作用的首要问题，解决好“怎么投”是路径问题。

例如，进一步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核心技术的投资力度，这涉及我国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及综合国力的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核心技术研发不起来，我国经济发展就会处处受制于人，中美经贸摩擦的重要启示之一就是必须把关键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本国手里；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和进一步加大对民生性服务业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力度，当前尤其是要进一步加大对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力度，为发挥科技创新第一动力作用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

刘长庚表示，目前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比较突出，持续保持投资规模的合理增长是必要的。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情况下，我国更应有效发挥投资对稳增长、惠民生的重要作用，在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方面进一步加大投资规模，固定资产投资率建议保持在60%—70%的水平，加快抑制投资规模不断下降趋势。其次还要充分调动各类主体的投资积极性。